

车慕奇 著

北京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风波的前前后后

人民中国出版社

D661

车慕奇 著

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责任编辑：李雪琴 陈忆青 陈肇莘
封面设计：李玉鸿

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
车慕奇 著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外车公庄大街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150千字 印数1—60000册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65-070-7/D.163

定价：2.75元

序

听说过这样一件轶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一位失宠的伯爵，隐居在荒岛的灯塔上埋头从事历史著述。一天，灯塔下发生一起斗殴事件，伯爵站在窗口观看了整个过程。第二天，一位朋友来看望他，谈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叙述的情节竟与他亲眼见到的大相径庭。伯爵感慨万分，喟然叹曰：“昨天刚发生的，而且都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两个人的结论尚且如此不同，何况是千百年前的历史！”于是，他把已经写成的书稿付之一炬。

如果这件轶事只是说明历史的难写，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我决不赞成那位英国伯爵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态度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事实终究是历史事实，任凭怎样掩盖、歪曲、篡改，最后还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直的历史学家，从来只对历史负责，而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褒贬、毁誉。焚稿，只能说是对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相不负责任。

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千千万万学生、教师、学者、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目击了全部事实。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缺少一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对这动荡的56天的纪实性著作。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落笔，也许是因为事情过于复杂还没有理清头绪，也许是因为对问题的认识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是还在等待什么……。然而，西方的宣传家却仍在无休无止

地胡说八道，往这段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上任意涂抹斑驳陆离、千奇百怪的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车慕奇同志写出了这本小册子：《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他本身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已经“超期服役”的新闻战线老兵，长期的慢性病使他已经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健笔纵横，日试万言。但是，他勇敢地拿起了笔，写出了他认为应当写出的历史真相。如果他不写，没有任何人苛求他；写了，有可能招来一些麻烦。然而，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在如此重大、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面前，他不能像那位英国伯爵那样保持沉默，而应当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尽管他非常清楚，在震耳的喧嚣中，他微小的声音不足以振聋发聩，但他相信，正义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当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的时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一定会在丛中微笑，得到它应有的评价。

作为车慕奇同志的朋友和同行，我首先对他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同时也感谢他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信任。言之无文的我，写不出更多赞誉之词，想说的只是证实一点：他说的都是真话、实话。这些真话、实话，不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才说的，而是在那惊心动魄的56天中，经常通过电话、见面向我讲过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对历史、对自己负责的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的实实在在的话，我完全相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

范敬宜

（《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0年3月22日

目 录

序	范敬宜
一、爱国民主运动，抑反政府动乱?	3
二、为什么流血避免不了?	22
三、从清华园看动乱	49
四、与北京相呼应的上海动乱	67
五、风波平息后的思考	88
六、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 ——40年的回顾与展望	114
附: 北京风波大事记 (1989年4月15日—6月9日)	147



一 爱国民主运动， 抑反政府动乱？

从总书记失态讲起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学生，他拿起扩音喇叭说了一番话，总的意思是劝学生停止绝食。从电视新闻上看他说话的神态有点失常，结结巴巴，前言不对后语，失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应有的风度。我边看边为他着急。

我正思忖着，听他冒出一句：“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卧过轨，不考虑后果……”顿了顿，没有说下去。我听了不觉一惊，心想，难道他后悔了吗？他怎么能把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卧铁轨抗议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爱国行动与今天学生以绝食向人民政府请愿的行动相提并论呢？

现在已经很清楚，赵紫阳对学生说这番话时，已决心与党中央分道扬镳了。当晚，他就没有出席党中央召开的宣布派军队进驻北京的干部大会，从而在电视荧屏上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他的分裂态度。当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时，在公开亮相中失态并不奇怪。正是这种时刻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迹。

我对赵紫阳“卧轨”的一段话特别敏感，因为我年轻时候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不但游行、募捐，与国民党政府的市长

辩论，还参与了游行罢课的策划，在“密室”里接受地下党领导人的指示……由于我在学运中出头露面，被学校开除，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对此，我从未后悔过。然而对1989年春天北京发生的学潮，从一开始我就有所警惕，当它发展成动乱之后，我就坚决反对，以致与一些好朋友发生争执。他们不解道：“搞学运的人为什么也反对学运？”我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说得清楚一点，解放前，我们参加的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而这次学潮，尽管有人千方百计想冠以“爱国民主运动”的桂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显示它的矛头所向不对头。在这场斗争胜负分晓之后，它的策划者、组织者严家其（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万润南（原四通公司总裁）、吾尔开希（“高自联”头头）之流逃亡美国，低三下四地乞求洋主子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这岂不明白地显露他们丝毫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吗？

性质的不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方励之（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严家其一帮人所策划、组织的学潮真是“爱国民主运动”的话，人们支持声援就是正当的；政府反对、镇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爱国民主运动”而是反人民政府的动乱，那么，结论就正好相反。

让我们从学潮爆发一开始来观察分析这场风波的性质。

借悼念胡耀邦发难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风波是从4月15日天安门广场英

雄纪念碑下出现第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开始的。学潮一爆发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与学生生活待遇、学校管理一类涉及学生自身利益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胡耀邦逝世的讣告发表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许多挽联、大字报和小字报，借悼念胡耀邦之名提出政治性很强的口号。就在4月15日下午，当中午电台刚广播了讣告之后，人民大学就出现这样的对联：

悼胡公(胡耀邦) 骂李公(李鹏) 不如倒邓公(邓小平)

说千条 道万条 不如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

在杂乱的大小字报中，这副对联一语道破天机，说明悼念胡耀邦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对邓小平呢？关键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四条有一些人恨之人骨，千方百计地要把它从宪法中砍掉。问题的关键在于砍掉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党和政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就要改变颜色。

为什么一场推翻与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风波从胡耀邦逝世引发出来呢？

这场政治风波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原计划在5月4日借“五四”运动70周年发难的，胡耀邦的逝世则为其策划者、组织者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时机。学潮提前发动了，而且借助胡耀邦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壮大了抗议示威的声势。

胡耀邦在群众和广大学生中是有很高威望的。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复出参加党中央的工作之后，做了大量受到党和人民称道的工作，譬如，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件事很得民心。他猝然逝世，人民悼念他，党和政府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人无完人。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失误，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对那些坚持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化的人采取纵容的态度。1987年1月，他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辞职，不再担任总书记，后来仍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逝世。在悼词中有一句：“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这既点出他有错误，又从正面肯定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在悼词中如此写是恰如其分的。

那些企图制造动乱的人，利用了群众怀念胡耀邦的感情，造谣攻击党中央对胡耀邦辞职处理不当，还造谣说胡耀邦是在政治局开会时被李鹏气死的。他们公然提出：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学潮初期，通过学生头头王丹（北京大学学生，后为“高自联”头目）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中，这二条是最主要的。与学生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人物在社会上制造舆论，也是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4月19日，由《新观察》总编辑戈扬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参加者有严家其、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为胡耀邦“平反”；二为反自由化翻案。

为什么他们把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集中在这两条上呢？因为这两条既与胡耀邦有关，又直接指向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下子就把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变为带有强

烈政治色彩的学潮了。他们的手段是相当巧妙而毒辣的。

在这两条要求中，重新评价胡耀邦实在无多大道理，因为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说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评价已是够高的了。回顾中共中央发布的周恩来的讣告，称这位中外崇敬的伟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两相比较，对胡耀邦的评价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所以学潮组织者所提的第一条不过是为了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实质性的要求还是第二条所提的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是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下的定义。决议中加不加这句话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在草案付诸表决时，有一位中央委员当场提出异议。邓小平为此对全会说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现在重读，联系当前的斗争还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

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讲这番重要的话是在1986年9月28日。主持会议的是总书记胡耀邦，他实际上没有十分重视邓小平这番话，以致没有加以公布也没有向下传达，尤其是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力，在1986年底北京、上海学生闹事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提出辞职。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专门作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共产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同年1月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作家）、方励之、刘宾雁（作家）被先后开除出党。

回顾1986—1987年这段经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学潮的组织者方励之、严家其、王丹之流那么痛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以此为突破口达到制造动乱的目的。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一种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说就是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所以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必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必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方励之早在 1986 年就说得明明白白：“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全盘西化。……我这个全方位概念，是让先进的文化全面的冲击中国，不是说哪个角度不要冲击。从经济、知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标准，全方位都可以冲击。但你不要先说哪个一定好，你不要先说坚持四条（指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坚持那个，我觉得没有必要。”（1986 年 11 月 16 日在华东化工学院一座座谈会上的发言）

因此，十分清楚，方励之、严家其、王丹之流提出彻底否定 1986—1987 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矛头就是针对四项基本原则。学潮一爆发，大量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以 4 月 15 日出现的“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四条”提得最为直接了当。所以，风波乍起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的对立。

4.27 游行说明什么

从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到 22 日治丧结束，学生借故闹事，不仅大小字报铺天盖地，游行不断，罢课扩大，冲击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还在追悼大会会场上聚集 10 万人“闹丧”。事态发展越来越让人忧虑。4 月 26 日《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明确提出这是一场政治动乱。

后来知道，这篇社论反映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对学潮的看法。4月24日晚李鹏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对事态发展作了分析研究，次日上午邓小平表示同意中央常委的分析和决定，指出这不是一般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这篇社论一发表，广大学生并没有看懂，误以为政府指责学生制造动乱，实际上是说极少数人利用学生制造动乱。那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却看懂了，既然已被政府点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策略上改变口号，降低政治调子，以争取广大群众。

4月27日，北京高校3万名大学生举行一次“成功”的游行示威。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时，见主要街道口有许多公安干警，尽管都是徒手，连警棍也没有带，但我仍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听说，前一天各大学的领导和教师都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游行，我暗暗希望他们能听从劝告，不要上街，以免与干警发生冲突。

在办公室内，我的心安不下来，就担心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扩大事态，后来听到街上喧闹声，忍不住走到门口观望。我看到警察排成行拦在街口，学生队伍过来一冲，他们抵挡不住，也就让开，没有动武。学生的队伍组织得相当好，有纠察队手拉手维持秩序，令我惊奇的是口号划一，打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

4月27日的学生游行对其策划者、组织者来说无疑是“大成功”，它以虚假的口号赢得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同情和

认可。我就听同事们说：“你看学生多么可爱呀！他们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平时，我们对官倒腐败现象一再提意见，没有什么用，学生这一闹，政府该重视了吧！”

我不同意他们天真的看法，劝他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从游行队伍的口号改变和降调就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第一，口号的改变和降调是一种策略转变，为的是争取广大群众，一旦将群众拉到自己一边，就可以继续制造事端，逐步提高口号的政治调子，以煽动群众进一步与政府对抗；第二，口号的降调说明学生背后有懂得掌握群众运动策略的人在幕后指挥。

我这样说，同事们并不信服，他们说：“你能指出幕后策划者是谁吗？”我说：“从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变化说明一定有高明的人在背后操纵，究竟是谁，你就等着瞧吧！”

后来，《北京日报》6月16日发表一篇北大学生来信，果然揭出内幕：“4月26日，我们都被《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即方励之的妻子，北大物理系副教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他急急忙忙参加会，会上订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

这就是说，方励之及其妻子李淑娴在背后指挥“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之后，发出“新学联一号令”，统一规定了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在方和李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4月21日，正当动乱初步形成时，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都贴出一张题为《原来是个阴谋》

的大字报，署名是“北大一醒者”。据这位同学说，李淑娴等人为运动安排了四步：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我们的政治要求。群众最恨腐败，别直接提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就用这一点（腐败）攻他们。第二步则到新华门（国务院大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特别是女生，心软；就说警察专打女生，也能引起男生的“汉子感”。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

事态正如方励之、李淑娴们所预谋的那样发展，只不过“五四”的高潮并没有形成，于是后来他们又策划了绝食请愿。

反腐败口号只是陪衬

应该说：4月27日以前，校园里和学生游行队伍里所提出的“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等等，尽管反映了学潮策划者的本意，但在群众中是得不到多少响应甚至不能赞同的。4月27日，他们改变策略打出“反官倒、反腐败、反官僚”为主调的口号，一下子抓住了民心。

许多好心人同情学生，就是看到这次游行所打出的“反腐败、反官倒、反官僚”的口号。其实，这些口号和要求，党和政府一开始就指出是同党和政府的主张一致的。5月4日以后，学生就不提这些口号了。